

※ 採訪報導 ※

「非 | 常經典」研習營側記

朱先敏^{*}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科技部「文學一」學門、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攜手中興大學文學院舉辦的「非 | 常經典」研習營，在中興大學人文大樓進行為期四天的活動。研習營最後一天早晨，學員們在飯店一樓大廳集合，等著搭車前往會場。學員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或是準備著稍晚的小組報告，或是談論前一天在鹿港豐富的參訪行程。肩負著報導營隊花絮任務的採訪小組發現，本次研習營的籌備委員胡曉真老師也與導師、學員坐在一塊談天說地，遠遠望去很是熱鬧，幾乎看不出師生的區別。

這四天裏，除了聆聽九場各具特色的講座之外，學員們還在導師帶領下進行分組討論。而每一場討論都需要在隔天早上分享給全員，並即時進行問答和討論。這樣緊湊、充滿對話性和教育意義的課程設計，使得學員與學員、學員與導師、學員與講師之間迅速地熟稔起來。讓剛剛進入研究所的新苗有機會親炙學術上的典範，並在一場一場的講演和討論中摸索出可能的努力方向，或許就是這場研習營最動人的地方了。

一、徐葆光與《中山傳信錄》

研習營的第一場由廖肇亨老師主講。主持人吳冠宏老師特別提到這場研習營的特殊性：過去學界的資源主要都放在議題的提倡，讓青年學者、老師有機會交流意見和觀點；這次的「非 | 常經典」研習營面向的則是各領域的研究生。「今天看到很多年輕的面孔，就是學界的希望」。吳老師又說：「這場演講顯示出材料的開發

* 朱先敏，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八月二十八日開幕式全員大合照

對於學術研究很重要，而廖肇亨老師在開發材料的同時還注意到怎麼詮釋、怎麼運用。這是一個具有教育性的議題。」

廖老師的演講從研習營主題「經典」的定義出發。老師指出，「經典如何形成」是討論古典文學時的重要問題。我們活在當代，覺得典律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有些文類卻從原先負面的評價翻身，最明顯的例子是明代小說。由此可見，我們曾經以為的「經典」，其實經歷過長久辯證的過程。藉此我們可以反思的是，文學史沒有教到的作家、作品、文類，在不同國家、不同學術領域裏是否正是別人的經典？比如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

《中山傳信錄》這本書在中國文學史既有的架構和觀點下，不容易被注意到，但它在交流史上其實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要研究《中山傳信錄》必須要注意這本著作的生成脈絡。徐葆光是琉球冊封使的副使，自一四〇四年始，每逢琉球新國王登基，中國皇帝便會派遣冊封使前往。「冊封使」牽涉到琉球王國的雙重政治體制：它既是個獨立王國又同時向中國、日本進貢，因此形成了三個國家之間複雜又多元的關係。清代開始，每一次出訪琉球的使團都留下了相關詩文，因此清代有許多以琉球為主題的著作，逐漸形成了在前人詩題上翻陳出新的現象，建立了屬於琉球冊封使之間的書寫傳統。

《中山傳信錄》從書名上就具有考據學性質，這是受到了晚明以後考據學風

的影響。由於晚明以前的琉球紀錄有太多想像和暗喻，徐葆光因而有意識地決定要「徵實」。這本書在日本的迴響很大，也成為歐洲人認識琉球的契機。甚至可以說，建構琉球文化重要的人就是徐葆光了。廖老師認為，《中山傳信錄》的研究其實可以從很多面向去談，比如使節前往琉球時會看見臺灣，因此使節留下的文字紀錄也對臺灣研究別具意義；這牽涉到臺灣如何被發現、東亞世界秩序的複雜性，以及使節團結構等等。

老師也以詩文中鳳尾蕉、螃蟹、老鷹等意象，或者《中山傳信錄》裏詩畫結合所展現的當代文化風尚，示範如何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討論琉球使節作品。廖老師提出三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如何以文學研究的眼光看待其他領域的經典。第二，注意不同著作之間不同的預設讀者。最後一點，老師提醒學員，注意當代討論「現代性」時很常提到的異國經驗、時空觀；但在論述的過程，一定要注意文本生成的語境，因為概念需要立基於土壤，有基礎才能產生火花。徐葆光與《中山傳信錄》就是很好的例子。

講演結束以後，廖老師特地預留了半小時給學員發問。因為這場研習營不只是講者單向的傳遞，更重要的是，鼓勵剛剛進入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勇於表達，並與老師們進行對話和討論。有了廖老師一個半小時的引導，接下來的綜合問答果然十分踴躍。雖然在中文系的學習過程裏不太容易觸及琉球使節詩文，但學員們都能從自身熟悉的材料出發，與本場講題對話。比如，自《樂府古題》以來就屢屢出現在詩詞中的「龍涎香」，徐葆光在異地記遊時所寫下詞作裏也使用了，兩者的意象是否有所不同？或者討論徐葆光與琉球文人宴飲賦詩所構成的政治與文化意義。也有學員好奇《中山傳信錄》的流傳及選用意象，對不同國家如法國、日本、東南亞的影響。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位學員問及，研究徐葆光文學創作是否需要考量審美價值。這其實是在重構經典的努力過程中，很容易面對的質疑：究竟我們讀這些文本是因為它的文化意義，還是因為它「夠好」？廖老師指出，當我們已經意識到審美標準是一種建構後，現階段很難再用傳統評價詩詞的標準去看待詩文，因為好壞的定義是隨著時代變化的。與其用傳統的審美價值來判斷，老師更願意從「主題」來看待徐葆光的詩。徐葆光的作品在詩題上具有開創性，比如他創作了〈中山八景〉、〈中山竹枝詞〉。也許他的作品在廣義的文學史上沒有很大的影響，但他對當時的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和評價是可以再討論的。

會後訪談

在這場充滿異域風情的演講結束以後，我們趁著休息時間對兩位老師進行了短訪。現任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的吳冠宏老師，對於本次研習營懷抱著極大的熱情和期許，他認為，「非 | 常經典」研習營從主題、講師、導師到學員，都展現了豐沛的能量。由深耕各個領域多年的學者帶領，讓年輕學員們通過彼此對話、沒有學科界限的各個講題，學習如何發現新材料、新視域，進而在這具有開放性的思考架構下，去碰觸研究與學術的核心和本質。「各個學門其實都在面對高教危機，也必須面對去中國化的議題」。吳老師接著闡述：「中文學界如果沒辦法好好回應這兩大難題，可能就會錯過了漢字文化能夠站上世界舞臺的契機。」因此，吳老師將這場面向學生、具有教育性的研習營，視為對研究生們的「精神補貼」。「很多研究生的補助是補貼生活費或更具實務性的方式，這種補助當然很重要，但如果在此同時，我們還能舉辦激發研究潛能的、有趣的學術研習活動，向下紮根、培養學界的新血，源頭活水將會無所不在」。

在這場研習營之後，吳老師對中文學界的活動，更進一步的期許是什麼？吳老師說，他希望對學術種子的培養要向下到大學三年級，讓具有研究興趣和潛力的學生，在大學畢業前就有紮實碰撞何謂學術的機會。其次，也希望讀完學位的研究、博士生仍然有繼續進修的動力。正如這次研習營邀請五位年輕學者擔任導師，他們不但對學員有引航的作用，也讓他們能夠加深、加廣自己所觸及的領域，與講師、其他導師，以及自身對話。

吳冠宏老師注意到，現有的研究生補助可以具有更多面向；而本場講者廖肇亨老師關心的則是，如何讓中文系既有的訓練更豐富。長期關心明清佛教和東亞交流史的廖老師，這次選擇不講自己鑽研多年的宗教研究，而要帶領學員看見長期被忽視的琉球冊封使，起因就是意識到中文系教學的「偏食」。三年前開始在臺大中文所兼課的廖老師，發現在西方影響力巨大的徐葆光，以及對政治、宗教系學生來說很重要的使節及交流等相關著作，難以被納入現階段中文系教學的框架。「所以這次研習營其實原來有個小標題叫做『被遺忘的經典』，我希望把在文化交流史或其他領域已經具有一定地位的作品介紹給年輕朋友」。廖老師又說：「我認為我們已經走到重寫、改寫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階段，那第一步就應該將被遺忘的材料拉回世人眼前，重新閱讀和定位。」廖老師試圖鬆動人們對「經典」的想像，意識到經典的形成其實肇因於許多條件，也會受到文本以外的社會脈絡影響；經典成立的不確

定性，在往後幾天的講演裏，也不斷被各位講師反覆地思索和討論。研習營各個講次因而提出線索，帶領學員出發，找到研究的新可能。

最後，我請問廖老師，有志於進入東亞使節與交流研究的研究生，該如何充實自己？老師舉出了自我鍛鍊的三招：

第一，語言能力一定要好。作為漢字使用者雖然在閱讀日、韓、越的漢文文獻有優勢，但不能滿足於此，而必須觸及以當地文字書寫的材料，才能真正理解相關著作和文人生長的大背景。

第二，不能忽略同時期中國的發展。因為交流、互動一定是雙向的，知道中國流傳了什麼過去，才不會受限於材料、視角的偏狹。比如思想史中的陽明學、文學史上的神韻、格調派，都是有志於東亞交流研究的學生必須打好的基本功。

第三，最重要的是心態。不能再以中國本位思考問題，即使完全捨棄中國本位是不可能的，但也必須意識到自己會有這樣的盲點，才能更開闊地看待相關研究。比如佛教禪宗在中國是放在宗教史的脈絡下被認識，但在日本卻牽涉了思想、生活方式和生命態度。

「有比較才看得出各自的特色，將中、日、韓並列可以看到不同的表現，這就是比較文化的基準點。而藉著他者的眼光，去發現自己原先習以為常的事，在別人眼中居然這麼特別，這就是『陌生化』的魅力」。廖老師感嘆地總結：「文言文並不迂腐，其實可以很有趣啊！」

二、論《金雲翹傳》的經典化過程

「非 | 常經典」這個研習營主題有趣的地方，在於每一位老師都對這四個字有不同的解讀。第二場主持人周大興老師認為：「非常，就是不能常，不能一成不變。」扣合到陳益源老師的主題，就是兩本著作充滿變化的經典化過程。

陳益源老師對於研習營主題的理解是：「有些東西『可以』成為經典，但以前不是經典。」所有的經典都是不斷被訴說、不斷被喚起，如果有些作品有個時期是經典，但僅限於某個時期；或者有些作品曾經被淹沒，隨著時間終於被發掘。如果文學史中沒有記錄，那如何成為經典？

說著，老師現場對學員提問：「大家聽過《金雲翹傳》和《海南雜著》嗎？」大部分學員都不認識這兩本著作，這也是陳老師努力想推廣這兩本書的原因。《金

雲翹傳》一直被視為典型的明清才子佳人小說，如果《金雲翹傳》一直被放在這樣的脈絡裏，那注定是要被埋沒的。「然而這個故事卻走進越南民族的心靈」。在說故事前，陳老師給了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開場。

《金雲翹傳》有一個才子佳人式的開頭，男女主角意外相識，兩心相許，但王翠翹為了救父親把自己賣了，自此在青樓過了十五年的黯淡生活。直到為朝廷立功，勸降了大海盜，又因為朝廷背信殺了大海盜，而跳河贖罪。「王翠翹有成長，對未來有期待，一次又一次期待的破滅，但從未放棄希望。這個性格打動了越南詩人阮攸，將其改編為長詩」。

陳老師說，《翹傳》在越南至今仍然是重要的作品。有研究「翹學」五十年因而成名的學者，也被翻譯成各國文字；這個故事也被多次改編成戲劇，越南的第一部電影拍的就是《翹傳》。二〇一八年，越南政府還發行了《金雲翹傳》年曆，每一頁都有〈翹歌〉。「如果我們臺灣試著找尋自己的經典，希望大家注意，九千萬人口的越南在面對自己的經典時，直到現在仍然用這樣的力度在行銷」。經典需要不斷重燃熱度，老師於是反問，我們如何尋找自己的經典，並使它歷久不衰？

中國明末清初的小說被越南學者帶回去，改編成十九世紀家喻戶曉的詩歌，以口傳的方式又傳回廣西成為京族的民歌。京族，是越南漁民追逐魚群到京族三島定居而形成的族群，成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只有兩三萬人。在那裏流傳著〈金仲與阿翹〉的故事，就是《金雲翹傳》的一個變形。因緣際會下，陳老師到京族三島進行田野調查。老師極具趣味性地分享了他高潮迭起的田調經驗，有陰錯陽差的惋惜，也有曙光忽現的驚喜。

陳老師對《金雲翹傳》如此總結：「透過阮攸的創作，越南人發現自己的語言可以這麼深刻，三言兩語可以道盡難以形容的心情，文學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功不可沒。越南人不把王翠翹當中國人，而像是典型的越南人，因為越南人即使身處黑暗也期望光明。幾次大戰中，都有將軍引用《翹傳》的歌詞，鼓勵士兵英勇抗敵，要有王翠翹的精神。這就是越南的文化遺產。」

在看見越南如何尋找經典、營造經典、愛護經典之後，陳老師也向學員們推薦他心目中的臺灣經典。蔡廷蘭《海南雜著》是第一本被翻譯成外文的臺灣文學。開澎進士蔡廷蘭到江西當知縣之後從未回過家鄉，但澎湖至今流傳許多蔡廷蘭明察秋毫的斷案故事。陳老師說，《海南雜著》是他心中一本足以成為經典，但還沒成為經典的作品。在臺灣，研究史學的人比較關心蔡廷蘭，研究文學的人則較少注意到

他的價值。這本緣起於「漂流」的著作，展現了海島浪漫、狂野的民族性與文化氛圍；同時，這場海上奇遇也是獨屬於海島人民的經驗。這些特殊的文本性質，使得《海南雜著》具有值得文學研究者深入探索的研究價值。

蔡廷蘭在福州參加舉人考試不第，回澎湖時，遇風被吹到越南中部，《海南雜著》的第一篇〈滄溟紀險〉就是臺灣經典的災難文學；除了有精練的文字、驚險的情節，還有臺灣特有的文化特徵，比如每一艘船上都有媽祖旗的海神信仰。漂流到越南的蔡廷蘭，為了避免護送他的越南官兵藉機牟利，堅持要從越南走路回國。在越南走了三個月的經驗，讓他發現中國過去對安南的書寫有太多虛構和想像，因此他選擇從文學、戲劇、民生各方面仔細梳理越南史。

二〇〇四年八月，陳老師與澎湖文史工作者一起，重新走了一遍蔡廷蘭的路線。蔡廷蘭一個落難的秀才，生死未卜、語言不通，還能沿途保持好奇心與人溝通、了解旁人、認識旁人、介紹旁人，寫下了這本著作。這樣堅毅的心志讓人驚嘆。而《海南雜著》所記載的越南風俗，與阮朝華僑鄭懷德《嘉定城通志》若合符節，可見蔡廷蘭觀察入微、深入民間，是多麼認真地去瞭解越南社會。

《海南雜著》在世界上流傳的相當廣泛，俄文本、法文本、越文本出版多年，日本學者甚至召開《海南雜著》讀書會，逐字逐句校勘、翻譯，當作東亞交通史的重要材料；韓文本在今年也將要出版。由此可見，世界上各個角落都為蔡廷蘭的經驗感到驚艷，臺灣自然不應該在這樣的熱潮下缺席。

陳老師充滿感情的呼籲：「這樣一本在世界上發光發熱的書籍，證明了臺灣也有經典。我們忘了蔡廷蘭的《海南雜著》，也忘了林則徐〈讀海南雜著六首〉，忘了《海南雜著》曾經擁有的價值。我希望哪一天〈滄溟紀險〉能被選入教科書，但距離他成為經典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讓這本應該是經典的不是經典，能獲得應有的肯定。」

會後訪談

陳益源老師充滿熱忱的演講，讓人對《金雲翹傳》心生嚮往，也更想深入探索被老師視為臺灣經典的《海南雜著》。我問老師，為什麼選擇《海南雜著》介紹給「非 | 常經典」研習營的學員？老師回答，值得成為經典的種種標準裏，他最看重的是民族精神上的共鳴。比如《翹傳》在越南人面對戰爭時負擔起鼓舞士氣的任務，就是因為王翠翹的人格特質呼應了越南人的價值觀。「《海南雜著》的精神象徵

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種臺灣精神。那種堅強的、有毅力的性格，身處逆境卻不放棄對別人的關心，是最能與臺灣人產生共鳴的人格特質」，老師鏗鏘有力地說。除此以外，老師也強調，經典是隨著時間不斷更新的，《海南雜著》甫一問世就被翻譯成俄文版，在剛出版的五十年內，其實很多人關注，頗受讀者重視，只是後來慢慢地被時光淹沒。由此可見，「經典」不是一成不變的，仍然需要被關注、被喚醒。

如何發掘出被歷史的塵埃掩蓋的經典，是陳老師試圖帶給學員的。「經典不是硬推銷出來的，不然即使一時成功了，也會因為時空變換而被汰換掉。唯有真正能打動人心的作品，才能長久」，陳老師說。這樣的作品，在老師看來就是蔡廷蘭的《海南雜著》：「還有很多人沒聽過蔡廷蘭、《海南雜著》，我覺得它值得成為臺灣和世界的連接。同時，蔡廷蘭著作所呈現的民族文化，正是臺灣人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訪談最後，陳老師忍不住喊著：「真的好希望《海南雜著》能被選入國文課本，讓更多人讀到啊！」那樣熱切的語調和神情，讓人印象深刻。也許對於何謂經典，每個人有各自的標準，但能親眼見證老師挖掘、提倡、推廣經典的熱忱和努力，正是研究生在初初踏入學術的領域時最需要學習的。

三、十二金釵誰登場

研習營第一天的最後一場由王安祈老師壓軸，主講《紅樓夢》的戲曲改編。主持人梅家玲老師點出了《紅樓夢》與研習營主題的呼應，在於《紅樓夢》一書對人情的細緻描寫感動了世代代的讀者。「《紅樓》各種表演藝術的嘗試，一直非常多。劇種、演員、時代性、地域性都會產生差異，如何在紛紜的《紅樓》戲曲改編裏，看出每一個不同的劇本可能的獨特性和帶來的問題，是很有意思的論題」。梅家玲老師如此作結：「安祈老師引領京劇改革與現代化，並得到高度肯定。今天她為我們帶來的正是具有啟發性、學術性的思辨和可能開展的面向。」

王安祈老師按照時序向學員們介紹了《紅樓夢》戲曲改編幾次的重要嘗試。這部受之無愧的經典小說，從出版之後就有許多戲劇改編。阿英《紅樓夢戲曲集》(1978)就收了十部崑曲《紅樓夢》劇本。「可是我看了之後好失望」，王老師說。戲曲的教化性質讓角色必須善惡分明，導致襲人和鳳姐甚至以淨丑行當來扮演，讓人為之心疼。

民初有梅蘭芳《晴雯撕扇（千金一笑）》和《黛玉葬花》兩部紅樓戲相繼登場。而上海的春柳社創社團長歐陽予倩，則另有《晴雯補裘》、《寶蟾送酒》兩齣。從民初紅樓戲可以看出，這是以個別人物，特別是大觀園女兒為主的改編方式，沒有人嘗試編一齣全本《紅樓夢》。

到了一九五八年，越劇終於以全本上演，在上海首演就大轟動。這部越劇甚至對香港電影也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這齣劇的走紅，使得香港電影公司拍成了第一部戲曲電影。所謂「戲曲電影」保留了戲曲演員的唱段和身段，卻用實景拍攝，兼具戲曲和電影兩種藝術的優點。這部電影灌錄成的唱片輾轉流傳到臺灣，也成為王安祈老師個人的京劇啟蒙。

老師引述了越劇編劇在黛玉〈葬花詞〉前新添的唱詞：「詩詞和唱詞是不一樣的。越劇編寫的唱詞有動作性、舞台感，是寫唱詞最重要的。它可以勾引演員、創造身段的衝動興趣。做音樂的人也會有創作衝動，因為他看到可以發揮的地方。好的唱詞能夠提供整個舞臺的需要。」老師舉這段唱詞為例，細膩地分梳唱詞和詩詞的不同，在於唱詞能夠暗示戲劇每一個環節的工作人員，如何協助整齣戲的進行。

越劇裏《黛玉焚稿》也是經典的唱段，據王老師說，在江南一帶只要唱開頭三個字，觀眾就會掌聲如雷。老師引述這段唱詞說明，戲詞需要自剖心境，因此需要鋪陳。所謂鋪陳不是詩歌概念的工整，而是讓觀眾面對只有簡單布景的舞臺，對前面演過的情節、對黛玉的一生勾起回憶。此外，由於唱詞是用聽的，觀眾可能過耳就忘，所以同樣的意思要重複唱，鋪排、延展、堆疊，才能形成印象。王老師更以個人的親身體驗，印證這個唱段的震撼力：「當我讀到《黛玉焚稿》的最後『把斷腸文章付火焚』，小學五年級的我決定，要以臺大中文系作為第一志願。成長歷程時的興趣，絕對會影響你將來要追尋的東西。」

越劇不但成就了一時經典，其劇本安排也成為後來各個電影電視的依據。直到一九九一年，由余秋雨編寫的黃梅戲才開始有意識地要寫出屬於九〇年代的《紅樓夢》。這齣戲強調了寶黛之間真摯的愛情，以兩人心心相印反襯社會的壓迫和殘酷。為了突顯這個主軸，這一版甚至拿掉了經典的焚稿橋段，因為寶黛兩心相知，根本沒有誤會，自然不必焚稿。兩相對比會發現，清婉靈秀的越劇強調的是《紅樓夢》的抒情性，尖銳冷硬的黃梅戲強調的是批判性；屬於當代的《紅樓夢》戲曲又會是什麼樣子？

王老師介紹了她重新製作的《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這齣戲由陳西汀編劇，一

九八三年後重新整理搬演，著名京劇家童芷苓到香港演了一次，之後不幸過世。王老師當時印象很深，因為擔心這樣一齣好看的戲會戲隨人亡。後來進入國光劇團擔任藝術總監時，老師就再一次排練了這齣戲。《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為了舞臺上的流暢度，調整了整個劇情的順序，也藉由對唱詞念白的精雕細琢，讓人物的性格更鮮明立體、富有層次。連小說中的小配角秋桐，也因而有了自己的心思和籌謀。

從投影片上一幀一幀的照片，到放映一小段一小段的影片，學員親眼見證老師所說：「從一九八〇年開始視聽媒介進步了，也更能保存各場演出的歷史變遷。」隨著戲中人的唱、念、做、打，老師對於戲曲改編的細膩安排，也更為生動可感。正如老師提醒學員的，研究戲曲一定要看表演，只讀文本真是紙上談兵。

會後訪談

王安祈老師的演講一結束，上前要簽名、表達仰慕之情、討論講座內容的學員就排起了隊。王老師準備了滿滿的兩小時講題，急急壓著時間，塞入海量的訊息，下了臺，人還有點喘。說起研習營「非|常經典」主題，王老師笑道：「越是經典的小說，改編的成果就越難成經典。戲劇改編常常是失敗的。」在王老師看來，越是經典的小說，人物越是有血有肉，將他們放進戲曲中有教化性質、善惡分明的框架裏，編劇難免左支右絀。

寫劇本難，選演員也難。「像寶玉那樣的人物，你怎麼找得到適合的演員呢」？王老師感嘆。演員的藝術成就往往與年齡成正比，越是在戲臺上打磨年月，越是有精湛功夫。「像《紅樓夢》這樣的故事，就是屬於年輕人的呀！可是找一個太年輕的演員，又哪來的舞臺經



王安祈老師課後討論

驗去駕馭這麼豐富的角色」？即使改編經典不容易，王老師仍然挑戰了《紅樓夢》裏讓人見之忘俗，卻又難以安排故事的賈探春。「《探春》這齣戲，我想講的是母女關係」，王老師一句話勾起了隨著探春無奈、隨著趙姨娘心疼的觀影體驗。在這齣戲裏，劇本給了趙姨娘更豐富的面向、更幽微的心事。母女情，也貫串起主線劇情裏多為配角的探春一條鮮明的故事線。「在我看來，戲曲比小說還貼近人心，一下筆，人物劇情就長在心裏。而演員搬演的時候，又生長成了自己的創作」。王老師的談話總是柔軟而深情：「有時候我這樣一寫、演員那樣一演，我們一瞬間就瞭解了彼此，在心靈很深的地方。我們在心裏相互依賴、相輔相成，也有點怕受傷。我很珍惜這樣深入合作過的夥伴，有時我甚至覺得，他們比日常生活會遇見的朋友更貼近我的心。」

從劇本的書寫、導演的指揮、演員的演出，不同專業的人為了同一個故事努力，透過劇本交流。而正因為戲劇是那樣豐富又複雜的組成，能不能成為經典，有時是機緣。「能不能成為經典其實不是單純劇本好壞的問題，有時是戲隨人亡，就像《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這麼好的戲，情節精練、演員能發揮、動作劇情都很豐富，但如果少了魏海敏這麼好的演員，我沒辦法重新排練這齣戲」。王老師援引課堂上講述的劇作，來解釋經典這回事。戲劇的形成需要各種條件的配合，劇情的氛圍只存在當下，每一個環節都要彼此應合，才能成就一場好戲。「演員很不容易，要收自己的眼淚、流別人的眼淚。演員演得好了，還要觀眾的偏好、戲曲的潮流，甚至宣傳策略都跟得上才行」。王老師深耕傳統戲曲多年，帶著對劇場的體會與「非 | 常經典」碰撞，於是讓學員們對於何為經典有了更多元的想像。

四、和刻本漢籍的多樣性

一大早進了教室，學員低聲交談著，嗡嗡作響。室內浮動著隱隱的焦慮，畢竟高津孝老師要談的，是大家都很陌生的日文訓讀。主持人廖肇亨老師於是提醒大家，高津老師不只關注和刻本，也是宋代研究的大家，更長期關注東亞文獻整理。因此，高津老師在評點、整理文獻、注意文獻源頭時，聚焦的其實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問題。

高津老師一上場，秀出第一張投影片，感覺到教室裏的浮躁馬上穩定下來。古文的刻本剪影，哪一個中文系的學生能說不熟悉呢？然而，字與字間的符號又是

什麼？高津老師從訓讀的刻印本講起，印刷術如何傳入了日本，又如何改良，令人訝異的是，日本用西洋活版印刷的鉛活字代替木活字、機械印刷取代刷版印刷的進程，其實受到朝鮮的影響很大。由此可見，東亞的交流現象，其實豐富又充滿能量，並不是單向的文化輸出。



高津孝老師講解和刻本

為了將近代以前的東亞共通語漢文以日語進行閱讀，因此出現了「訓讀」，刻印成書面紙本，就是「和刻本漢籍」。高津老師親身示範，帶領學員在現場進行了短短的訓讀教學，有一點日文基礎的人馬上就能掌握訓讀符號的規律，對這門學問一下子親近起來。

不過，高津老師的講授可不僅僅是要介紹訓讀而已，而是要將訓讀置於「洋涇濱・克里奧語」的概念下理解。所謂「洋涇濱・克里奧語」指的是，受殖民者或移民者在受到強勢語言的影響下，逐漸混用母語與外來語，最後形成一種新語言的現象。演變過程透露出的是，母語此一概念的政治性；也就是儘管掌握了語言，卻無法成為真正的自我認同。作為聲音言語，訓讀並不是在以奈良、京都為中心的語言權威的背景下，從日本列島的言語中內在發生的；而是在與中國人接觸的過程中產生的。由此可見，產生新語言是何時何地都能發生的事情。新的語言往往被高層語言所阻礙，例如法語原來是拉丁語支配下的高盧語的克里奧語，然而一旦背負上國

家背景，法語使用者就視自己為特權階級，而對於「純潔的法語」有許多美麗的幻想。

從「訓讀」概念回望「洋涇濱·克里奧語」，會發現訓讀呈現了較為簡略化的日文文法，也因此增加許多日語裏缺少的思想、政治方面的詞彙。而從江戶時期進展到明治時代，訓讀語已經可以表達日常生活的全部內容，漢詩也大量出現。正如「洋涇濱·克里奧語」的一大特徵，是可以無限借用權威語的語彙；藉由訓讀，日本人可以無限的漢語語彙作為自己的語彙，讓漢文的古文獻就是自己的古文獻。而在日本逐漸產生「和臭」觀點，正是由於語言接觸後，出現未被權威語回收的單詞和表現。這往往會出現在對宗主國和權威抱有自卑感的殖民地知識分子身上。然而訓讀的產生沒有殖民地背景，因此這種心態是產生於掌握漢字和假名文字的階層中，這和沒有文字的一般洋涇濱使用者不同。

由此可見，文化、國家之間的碰撞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強度，語言彼此影響的張力不一定只發生在殖民或移民之間。藉由高津老師的帶領，我們因此能看到語言、文化、國際交流的不同觀點。

會後訪談

訓讀對中文系的學生而言是既新鮮又親近的一門學問。新鮮的是，可以一窺日本人怎麼閱讀漢文文獻；親近的是，訓讀的素材往往正是我們熟悉的文本。在當天晚上的小組討論裏，高津老師的這場，果然也是學員們討論得最熱烈的一個主題。趁著短訪的機會，我們請高津老師為我們再多介紹「訓讀」。

「『訓讀』是很有趣的，它使得中、日雙方更容易接受、理解彼此的文化」。高津老師笑瞇瞇、不疾不徐地又說：「在日本，研究中國思想和歷史的學者，用的是『訓讀』的方法；研究文學的人則是要先學中文。用訓讀理解漢文文獻的好處是速度快，但我覺得像文學學者這樣，先學現代中文再讀文言文更好。因為如此，才能跟其他人溝通，溝通是很重要的。」

高津老師認為「溝通」、「交流」是現階段的研究者最需要的能力。他進一步說明，在使用訓讀的方法閱讀漢文時，日本人其實很少意識到那是中國的詩詞、文章，反而會因為太容易能夠理解，而覺得那些閱讀材料本來就是自己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訓讀往往是放在日語語言學的脈絡下被理解，高津老師則注意到，訓讀以及訓讀文本的刻印方式，其實展露了東亞各國相互交流、影響的痕跡。

「整個交流是雙向的」，高津老師提醒：「訓讀是交流的媒介，是文化碰撞之後的成品。所以我特別要拿訓讀跟『洋涇濱・克里奧語』這些不同語言交流下的產物對話。訓讀不只是半翻譯，不只是語言學現象，它其實是東亞文化交流的具體證據。」高津老師這次來研習營授課，不談自己耕耘多年的宋代文學與琉球文獻，而帶著自己最新的力作來與學員分享。「我覺得這樣的交流很好，像課堂上有同學舉客家話、粵語的例子來討論語言交流的問題，我覺得對我也很有啟發」，高津老師笑著總結。

五、李杜優劣論

進入第五場，每一場都能聽見老師們對研習營主題「非|常經典」的不同詮釋。主持人楊玉成老師笑稱，蔣寅老師談問題總是知識豐富、觀點獨到，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很有啟發性，值得深思和討論。而且今天的題目選得極巧妙，因為李白和杜甫真的「非常 (very) 經典」。

蔣老師認為，李白和杜甫的詩作已經很難再開闢新的研究題目，因此他關注的是這兩位大詩人對後世如何產生影響。李白與杜甫孰優孰劣的問題，從唐宋至今一直不斷有人試圖回應。而蔣老師與這個議題對話的第一步，就是要「還李杜在唐代本來面目」。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唐代選本中選錄這兩位詩人作品多寡為依據。因為鈔本時代文本的流傳是不完全的，唐選本沒有選入杜甫有很多原因，並不能以此論斷他不重要。李杜在唐代的地位，必須要回歸當時的情境來談。蔣老師提醒學員，李白在唐代的地位是身分與理想的錯位；因為作為道士和文學侍從，李白的政治地位和他的野心是不相符的。而杜甫在當時其實很受重視，從詩作中呈現出賓客盈門的情景可以想見。到了宋代，杜甫的偉大性開始被具象化，孟棅的詩史說，以及蘇軾、黃庭堅對杜詩的愛好，都強化了杜甫的重要性。相較於此，李白的詩則在宋代開始受到批評。

在重新梳理李杜的歷史評價之後，蔣老師希望帶領學員思考的是，如果要評斷李杜優劣，那麼成為經典的標準是什麼？老師引用余光中〈大詩人的條件〉一文中對奧登 (W. H. Auden) 《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序言裏所羅列經典的標準總結為：多產、廣度、深度、技巧、蛻變。除此之外，老師認為還需要加上三點：第一，才能全面，無所不備的包容性；第二，成熟渾化的完成度；第三，有獨絕之

處，敢於擺落常規。從上述的標準來評斷李杜，則能夠提倡新的審美標準的杜甫，自然是經典詩人。

杜甫對「老」的提倡，在蔣老師看來是最具經典性的。杜甫是第一位從「老」字來評論古今詩歌的人，從他的生命趣味到詩歌趣味也都能看出對「老」的偏愛。而不論精神層面和寫作層面都能看到杜甫對老境的體認，這種對「老」的發現與表現，啟發了後人，同時，後人也會以此看待杜甫。蔣老師由此總結：經典化的核心要素是思想、技巧、風格、詩歌美學。小家的經典化取決於技巧，名家取決於風格，大家取決於美學品格。在老師看來，杜甫勝過李白成為認可度最高的詩人，正在於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美學。

演講結束，蔣老師也特地保留充裕的時間讓學員提問。在踴躍的提問中，也出現了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比如，有學員舉早逝的詩人李賀和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名垂詩史的張若虛，問起這樣的詩人是否能擔當經典之名。老師回答：「這是兩個特別有意思的例子。以一篇的作品成經典的例子，作品一定是經典無庸置疑，但張若虛本人未必就此成為大家。至於早逝的詩人，即使有好的作品，聲音仍然比較『啞』，也難以成為經典的詩人。」此外，是不是因為杜詩易學才讓杜詩的影響力比較大，也是學員們比較關心的問題。老師則認為，李杜固然有可學和不可學的差異，但這不是評判兩者是否為大家的標準。就像很多人說詩學盛唐，骨子裏其實學的都是大曆十才子，十才子的詩自然好學，但並沒有因此讓他們成為大家。由此可見，杜甫成為經典和他是否容易效仿沒有關係。從這些深入而熱烈的討論裏，不難看出李杜真的是大家心中無庸置疑的經典了。

會後訪談

要談經典問題，李白、杜甫兩位大詩人的名字擲下來，絕對是毫無疑義。蔣寅老師這次談的不只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也要談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經典議題：李杜優劣論。原來，「非 | 常經典」指涉的不只是時代的浪潮一次又一次擊打著傳世文獻，作為研究者也必須要一再面對經典論題帶來的影響焦慮。「我想重新梳理『經典問題』，經典的作品在什麼意義上會成立？有沒有前人沒有看到的面向、沒有注意的要點、沒有爬梳的文獻」？蔣老師說話很和緩，含義卻很深切。作為研究生，在面對浩瀚的研究成果常常會感覺自己的無措和渺小，蔣寅老師提點我們，當面對已經被研究過的課題時，還能用怎樣的眼光去開發新意。

對於有志於挑戰文學大家、經典著作，甚至反覆論戰等大課題的學生，蔣老師提出了一些建議。「作為研究者，能夠去挖掘那些偉大、旺盛、成就高的作品當然是很好的，這些作品和作家也具備了足夠讓人挖掘的豐厚潛力。但是……」，蔣老師話鋒一轉：「這必須要有相應的研究能力。研究生要為學位論文選題時，當然要慎重，對這些材料要真的有想法，而不要只是因為『這個題目很重要』。」而在剛剛進入研究所的階段，學生又可以怎樣培養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談李杜的實力呢？蔣老師回答：「第一，要能揚長避短，知道自己研究上的長處和短處在哪裏，不要硬碰硬。第二，要多方面、全方面地讀書、思考，慢慢積累研究實力。第三，越是想要研究大作家，他的作品就越要細讀、精讀，才能品出別人沒發覺的滋味。」

老師也鼓勵年輕學子，不要急著觸碰大課題，「年老之後再回頭，也許就能看出有趣的問題。像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做李杜優劣論，先做別的問題，發現杜甫很重要，先談杜甫，然後才去碰優劣論的問題。興趣還是最重要的，你讀書的時候發現什麼問題？就勇敢去鑽研」。我想起曾經聽一位新詩詩人演講，他說有一首詩在他心中醞釀了好多年才寫成，不是等那首詩成熟，是等自己成熟。面對學術議題，我們或許也該培養這樣的耐心去守候一個題目的發芽、生長、綻放。

六、殊途異歸——非經典的古典文學研究

這場演講的形式比較特別，是由中興大學祁立峰、黃東陽和羅秀美三位老師共同主講。三位老師很有意識地面向平均年齡在研究所、博士班一、二年級的學生，因為處於這兩個階段的學員，往往對所謂「研究」還有些茫然或正在找尋、調整方向。首先上陣的祁老師以「細讀文本」為主軸，帶領學員一同檢視六朝時期的三篇辭賦。沈炯的〈歸魂賦〉、庾信的〈哀江南賦〉和顏之推的〈觀我生賦〉，都是時人應對侯景之亂所帶來的創傷而進行的書寫。祁老師詳細地辨析三位賦家在字裏行間所顯示不同的表現創傷的方式，並引用了互文性的概念來檢視這三篇作品。

黃東陽老師則以清代沈起鳳的《諧鐸》一書，帶領學員思考怎麼從閱讀文獻開始做研究。老師指出，要寫一篇論文，首先要思考題目在哪裏，而此時文獻就是幫助自己找題目的手段；要注意的是「別人怎麼說」，重要學者的評價、序跋所提供的線索，以及研究材料的底本選擇，甚至文學史和小說史上如何定位這本書。而在決定題目之後，需要發展自己的論述，可以藉用文學理論來刺激思考，但並非必

須以此作為主要研究方法。接著，需要選擇佐證文獻，也就是對研究主題以外，同時代文獻資料的掌握，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自己的研究對象。然後，要研析文本，也就是發現文本裏別人沒看出來的意義。在題目和論點之後，最重要的是，發展出合理的論文結構，同時也要注意「研究的快樂」。黃老師強調，研究要能快樂必須要達到三點：第一，清楚自己在研究什麼，同時也要讓讀者知道，這就是學術的價值；第二，自己知道適合自己的研究，而且別人也相信，這才有開展未來的可能；第三，能知、能行，然後能證，三管齊下，學術才會是你的未來規劃。

羅秀美老師想分享的則是「比學員們早開始做的一些研究」的心得。老師提醒學員：「以新眼看舊書，舊書皆新。」研究方法和視角是研究生立身的基礎。羅老師的講課以清末民初的才女單士釐為主；已有的研究裏，都將她定位成「女性旅行文學作家」，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也收錄了她的遊記。羅老師雖然也是由此開始注意到單士釐，但她發現有更多值得做的，這就是研究的起點。單士釐不但是個旅遊作家，同時也是一名翻譯家，翻譯了日本的宮廷女教師下田歌子的著作，以及永江正直的《女子教育論》。羅老師指出，晚清盛行的翻譯方式，是一邊翻譯一邊用自己的意思去說，常用中國的思想去對應外來的文化，所以當時的翻譯作品，都是一種「譯述」。單士釐對日本作品的翻譯也是這樣的態度。除此之外，單士釐也編輯了書籍，比如延續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而編成的《國朝閨秀正始再續集》，以及將身邊女性親友長輩作品集結而成的《懿範聞見錄》。藉由對單士釐的介紹，老師希望帶給學員對中國女作家更多元的認識：單士釐是在男性親友的扶持下，過得相當幸福的女性，從她的生命故事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男女相處的另一種面向。同時，羅老師也分享了她追隨單士釐生命旅程的田野調查經驗，鼓勵學員置身於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對於文本材料會有更周延的認識。

會後訪談

這場別開生面的講演，由羅秀美老師為代表接受訪談，論及「三種課程一次滿足」的課程設計，羅老師笑稱，這三個主題雖然年代、作者、性別、文類都不同，但共同點在於，三位老師注意到，每一種類型都是文人心事和生命經驗。「文學研究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這些作品如何能與讀者產生連結、產生共鳴」，羅老師說。而三位老師想要帶領年輕的研究生們看見的是，即使每個人有自己的專擅領域，但熟讀文本、理解作者都是第一步。「我們也希望中文所的學生不要迷失在理論和大

學者的研究裏；要有勇氣去面對文本，去抽絲剝繭拉出線頭，再去進一步看其他的材料是不是能幫助自己理解研究的對象」，羅老師強調。

而對於自己選擇女性文學作為主題的初心，羅老師說，自己一直希望能讓學生們看見性別不同不一定導致差異和對立，單士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然而，精研女性文學的羅老師又如何看待「女性文學史」和「文學史」之間的距離呢？「因為有女性，文學史才能多一個視角啊」！羅老師很自信也很坦然地說：「女性文學不是要顛覆文學史，而是要豐富文學史。」比如在教袁枚的〈祭妹文〉時，羅老師便會特別介紹這篇文章的主角——袁枚的妹妹其實也是一位有文集出版的女作家。「明清才女的作品大多是由丈夫或兒子幫忙出版的，因為有這些男性親友的幫助，女性文學才有流傳的機會」。羅老師試圖在教學中讓學生看見在文學史縫隙的女作家身影，以及屬於那個年代的男女相處之道。

帶著這樣的信念，羅老師在學校裏帶領著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去看見文學史裏女性的光亮。那麼學生的反應如何呢？「我覺得學生的研究興趣太集中在現當代」，羅老師感嘆：「有時不做古典，是對自己能否進入那個遙遠的年代沒自信，但其實理解現當代的文本也不簡單啊，有這樣的勇氣去做現當代，其實也可以嘗試一下不同年代的文學作品。」對於有志於學術的學生，羅老師建議，千萬不要忽略了實地考察的重要。以老師自己的經驗為例，不管到什麼地方旅行，一定都會思考有沒有研究對象生活過的痕跡，如果有，再遠都要去看看。

「跟自己的生活做結合，研究和生活是分不開的。即使找不到遺跡也是一種價值。文本不只在紙上，生命現場也是一種文本」。隨著羅老師的闡述，我們彷彿也能從故紙堆裏抬起頭，望向那個更遠大的世界。

七、臺詩三百首，行不行？

一連兩天的中國文學經典討論之後，學員們在第三天迎來了臺灣文學經典的討論。主持人廖美玉老師分享了和施懿琳老師一同為臺灣古典文學奮鬥的經驗。廖老師說，施懿琳老師念研究所的年代，想研究臺灣古典文學，沒有人會贊成。但施老師不但以此為論文主題，還在論文寫完後著手進行可觀的《全臺詩》編纂工程。然而，編纂不是終點，編纂之後還需要詮釋、創化，因此《全臺詩》的編纂小組還舉辦工作坊，進行討論。廖老師強調：「年輕人是重要的生力軍，我們的工作坊一定

留位子給年輕人、向下紮根。」

施懿琳老師在研習營前就出了課前作業，從《全臺詩》裏挑選了不同體式的詩作，請學員們選出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作品，讓學生們有機會預習一下平常較少接觸的臺灣古典詩。施老師一開場就回應了研習營主題：臺灣古典詩能不能從非經典納入經典，可不可能？在編了《全臺詩》之後，下一個階段是要編選《臺詩三百首》，這能成為經典嗎？

施老師認為，經典要推行，一定有一個力量。傳統中國認為，經典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儒家聖人撰述；一是當時政府認可。隨著歷史的變化，經典的定義不局限於儒家；在所屬的領域裏具有權威性、代表性，便足以成為這個領域的「典範」。老師於是引述許經田的說法指出，文學典律在當代最直接的界說，是指學校用的文學教材。因此，讀者很容易被學校教育告知什麼是重要作家，接著去閱讀他們的作品。文學教育因而規範了「有教養的文學」，受教育者經常在品味、感情、道德、價值上產生一致性。

文學典範看似放諸四海而皆準，但其實典律背後有太多歷史左右的誘因；至少包括文學社團、教育、文宣管道、文學批評界、創作者的自覺、出版傳銷者對典律「象徵資本」的運用週轉，政教機構的介入更是如此。

在對經典進行界定之後，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何謂臺灣文學經典」。施老師說，一九四五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建立的史觀是：先秦兩漢到宋元明清；再來是一九二〇年以後胡適、徐志摩、茅盾、巴金；再直接接到了臺灣當代。老師問學員，有沒有發現這個文學史的建構是不完整的、斷裂的？因此，當我們在思考臺灣文學的時候，不應該將古典與現代、臺灣與中國判然二分，應該思考臺灣古典文學在當代中國文學、臺灣文學論述下的位置。

施老師以自身的經驗，分享她對臺灣文學關注的緣起。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本土意識崛起，臺灣人發現自己學習的歷史、地理、文學都和切身的經驗有距離。因此，一九八三年正要寫論文的老師，決定以鹿港為題撰寫學位論文。而在八〇年代初期臺灣文學界發生了一場「臺灣文學如何定位」的爭議。詹宏志以〈兩種文學心靈〉為題，思考臺灣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定位，認為：「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引發了本土人士的批評，形成文學界「南北派」論戰，形成「臺北的」、「臺灣的」板塊碰撞，大小型的論戰不斷。

即使到了當代，相關爭議依然不斷。施老師介紹了二〇一七年底的一〇六課綱

爭議，比較強烈的論點是：既然「戰後治權」只及於臺澎金馬，難道不應該以現時治權所及的作家及作品作為文學教育的主體？老師提醒學員，過去本土派學者往往把文言等同中國、白話等同於臺灣，然而十七至十九世紀，在這塊土地上具有書寫能力的漢人知識分子，要表達他的思想情感、生活體驗、社會觀察，乃至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注、對強權的批判，使用的當然是文言文。雖然漢文常被認為太親近統治者，雖然漢文化不否認有被統治者馴化後的思維，但即使是當代的我們，仍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局限。「我覺得，活在島嶼上的人民所書寫的內容，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多，尤其是『邊緣』的海島，可能飽含豐富的思維和能量，將會溢出統治者所能操控的程度。要進一步去認識它、理解它，在篩選碰撞中，有時會漏掉，有時會選錯，但一次次碰撞下，會找到比較好的平衡」。老師如此介紹自己對臺灣古典文學的認知和期待。

施老師認為，理想的臺灣文學教材，應該以臺灣為主體，把來自島外文學養料納入臺灣這條長河，才能成就它的波瀾壯闊。「我們的中學生不一定要苦讀中國傳統的經典，但是在臺灣寫古典漢詩文的前輩，有許多思想觀念是來自傳統中國啊」！施老師如是說。他接著以日本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的轉型為例，說明日本現代教科書，還是依據江戶時代的學術思想觀點來選文；這展現了日本對自身文化的態度，不會因為其中有漢文化的影響而刻意排除。反觀臺灣十七至十九世紀的讀書人也是如此，他們喜歡老莊、陶淵明、杜甫、白居易，也喜歡蘇東坡。臺灣的國文教材應該這樣去認識這些對臺灣深具影響力的文學傳統，畢竟選文照顧到經典性和普遍性是很重要的，施老師強調：「這不是如本土派學者說的，為中國正統文化續命，而是為臺灣豐富的文化尋根。」

二〇〇一年開始，施老師開始進行《全臺詩》的蒐集、整理、編校、出版計畫，以地毯式搜索方式整理從鄭氏、清領到日治各階段的臺灣古典詩作品；「以人繫詩」。目前為止共五十冊，一一二九三一首，仍持續進行。二〇一三年臺灣文學館推出三十八冊的《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臺灣主題詩選》，接著還要進行《臺灣古典詩精選、詮釋》計畫。第一階段，精選臺灣古典詩三百首，以時代性、在地性、生活性為考量原則，同時兼具經典性及普及性。第二階段，篩選後針對每首詩進行作者生平介紹及題解、簡注等內容詮釋。希望讓社會大眾更親近古典詩，藉此了解古典詩精要及臺灣具代表性的詩人。

施老師會前出了作業，調查同學們對於臺灣古典詩的喜好。在課堂上也留出時

間讓同學分享自己的感想。學員從形式、主題、意識形態等不同層次對詩作進行解析。有人說，自己特別被某一首詩觸動，是因為其題材特別能與自己當下的生命情態共鳴。也有人在闡述自己的評價標準時，展現了個人的審美價值。



學員在施懿琳老師講座發表對臺灣古典詩的看法

老師總結學員們對詩作的評價和偏好，指出許多同學都是受過中國古典文學／詩學訓練的文化菁英，大致會受到幾個方面影響：「含蓄為美」、「溫柔敦厚」、「知人論世」、「化俗為雅」；對不合格律的詩作接受度比較低。熟知臺澎歷史情境的同學，比較能相應了解以此為主題的詩作。大多數學員對新事物融入古典詩，抱持批評的態度，這樣的嘗試或許可以放在晚清「詩界革命」的脈絡來理解，是否容許一些新變？比較俚俗的作品是否也有納入的空間？

有同學在做作業的過程引發了反思：我該怎麼去選詩？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感受是怎麼來的？切身經歷固然推動了讀者深入探索的動力，一方面也受到學科建制、社會大眾文化多重權力結構的制約。從課堂上的分享也看到，從不同地方來的同學在選詩上有差異，因為生長的環境不同。學員發現自己努力查閱文獻、還原背景，卻反而使自己的結論與研究者趨於一致，引發了不安。

這就是老師試圖回應的問題，也許經典的構成需要許多衝撞，需要不只一代的思考和淘選，也希望臺灣古典文學能進入臺灣文學的視界裏。

會後訪談

與施懿琳老師的訪談，是在老師開車前往研習營的參訪地點鹿港的途中進行的。老師一邊熟練地操控著方向盤，談及臺灣古典文學的大勢也是毫不含糊。施老師不諱言地說：「不只是古典文學，而是臺灣文學整體處境都比較弱勢。」然而，處境越難，就需要更努力發聲，否則就真的成為邊緣了。施老師認為，不要先把自己的文化、文學瞧得小了，而是要勇於討論、激發共鳴，展開一種昂揚的氣勢。「我覺得臺灣學生的戰鬥力太弱了，大家都很溫和平靜」，施老師對此不無焦慮：「不論是平常演講時的發言、提問，或是這次我出的作業，都可以看到大陸同學的認真和積極，我覺得臺灣學生要更努力。」

施老師也分享自己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觀察，老師發現，二〇〇〇年成大成立臺文所、臺文博士班的時候，生源多由中文系而來。「大家古典詩文的閱讀能力都不錯，對於臺灣古典文學的興趣也很昂揚」，老師說。然而，隨著臺文系所在臺灣遍地開花，也逐漸成為一個成熟的科系，古典文學受到的重視反而下降；各臺文系所開課多以近現代為主，對臺灣古典文學有興趣的，反而是中文系的學生。「讀中國古文讀得膩了，反而覺得臺灣的古文有新視界，而且又與自身密切相關」。施老師如此解釋這個現象：「其實分科是人為的，我們不需要被局限。中文系的訓練能讓我們更好地去解讀臺灣古典詩文，這樣也很好。」

在老師看來，中文系學生看待臺灣古典文學時，其實不需要壁壘分明，「用加法，不要排除」。老師說，能夠容納越多的材料，我們的文學、文化就會越豐富。而且現在研究臺灣古典文學，已經有很豐富的資源，不論報刊、詩文作品都集結成冊，還有電子資源。對於有志於從事臺灣文學研究的學生，施老師建議，隨時跟上最新的研究成果：「比方中研院臺史所每年都有研究回顧史，另外像是《文訊》出的《臺灣文學年鑑》會依照不同文類整理作品、作家。臺灣文學的線上資源也都建立得很完善，要隨時注意最近的研究課題和相關論述。」

除了鼓勵臺灣學生關心在地作品之外，老師也注意到臺灣文學如何在世界發聲：「我覺得，現在國際上臺灣文學研究，是點狀的互動，偶爾有零星的討論，要怎麼讓國外的學者對臺灣文學有興趣，我覺得蠻憂心的。也許能夠以中研院為號召，舉辦相關的研習活動，這樣的迴響會比較好。」在臺灣文學的推廣上，老師也不遺餘力。編纂《臺詩三百首》時就試圖在普遍性和經典性取得平衡，希望能以此

引發民眾對臺灣古典詩的興趣。此外，今年也發起了和臺灣文學館的合作，以繪本的形式介紹臺灣古典詩，讓小朋友能夠親近臺灣在地的創作。「《臺詩三百首》只是起點，慢慢推廣、慢慢進展吧」！施老師對臺灣古典文學的熱愛綿延了許多年，而她對推廣文學的信念也一步一步正在執行著：「下一步，希望能聽見詩歌的聲音，詩歌有聲音才是一種享受啊！」老師繼續開著車，我們也跟著老師駛向一個更美好的遠方。

八、漢詩、海洋、華夷風

研習營進入最後一天，讓人感覺到講座的设计上，無論時間或空間的距離都是廣大的。跟著授課老師神交唐宋、遠遊明清臺灣、神馳琉球日本之後，第四天早晨，我們隨著高嘉謙老師下了一趟南洋。

高嘉謙老師認為，漢詩是十九世紀以降文人出洋跨境寫作的重要文體，「詩」伴隨著移動成為最精準的紀錄。在這樣的過程中詩所產生的可能性，在移動過程中相應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境外漢詩時，應該要跳脫過往從「華僑詩、海外詩」來認知的結構。風土的討論不只是書寫者到了哪個地方，或當地特色是什麼，重點是外部變遷在自然、知識，以及移動過程的身體感與地方感；出洋的航線碰撞的華夷觀及西方知識的影響；以及外交官、知識人、華工、流亡政客集體參與的漢詩創作，使得境外漢詩整個生產結構有所不同。甚至連太平洋與南海藉由「漢詩」所形塑的景觀，都是面向境外漢詩時可以切入研究的重點。

老師於是提醒，研究者從漢詩的跨洋、相遇與播遷看見文人感覺結構的改變，從新的異國語言和事物看見詩語言如何重組，從新的風土的刺激看見詩人如何再形塑寫作視域。綜合上述的新發展，漢詩的意象和媒介、情感結構也因而有所改變。此外，「海洋」是境外漢詩中重要的物象和意象，但它不只是客體，而是能夠影響航海人與詩語之間碰撞的元素。藉由研究境外漢詩，可以觀察離散／流寓、自我／他者、守成／裂變、華／夷、內／外、言／文等，這些有同有異的概念不斷滑動的有趣現象。

藉由對境外漢詩的討論，高老師也與學界大熱的「華夷風」理論進行對話。老師指出，「華」既是身分也是族性，要注意「華」的歷史語境、「華」的複雜現況（也就是後代再華化的可能），以及「華」的困難限制（反血緣認定的身分認同）；

當然也包括華人和國籍之間的權力架構和文化認同的複雜。此外，身在臺灣的研究者，更難以避免過度談「華」會不會影響「臺」的主體性的思考。在這些思路的影響下，「華夷」的辯證變得複雜，不再從「華」辨認夷，以華為主導；而是更客觀看到交融和相應的語境。高老師將「華夷風」置於漢詩領域進行討論，希望能帶領學員看到在我們熟悉的文學寫作領域中，如何能通過華夷風去思考並提供新視角。

歷來對於「華夷」觀念的辯證和轉化已經相當的豐富。老師提醒我們，在閱讀相關的研究成果時，要注意在外部混雜的語境中，重新理解華和夷的元素交織所形成新的可能性，以此去觀察文學作品中的樣態和軌跡。而在史書美、王德威都提出華語系文學不同視角的詮釋之後，高老師特別強調「風」的概念，因為華夷風的意義是各華語社群以華語、華文書寫作為文化，因此必須正視移民與在地之間複雜的家族、地域、方言的群體關係；這些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華夷中擺盪的風向、風潮及風物。「華」的理解因而有更多層次。

高老師於是用實際的個案來一步步解析他的研究取徑和成果。老師首先回應了研習營第一天，廖肇亨老師談及的琉球冊封使徐葆光。他認為作為冊封使，徐葆光的文字書寫還需要兼顧在航海中測量的企圖心，如何認知周邊國度和地理環境，怎麼從帝國眼界觀察外部世界；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性如何被挪用到詩歌寫作上。因此，客觀的測量技術成為新的感覺結構，理性客觀的測量成為詩歌表達的一部分，知識性成為了身體感。徐葆光海上行旅所建構的新詩語和典故，使得科學／知識話語抽換了傳統的海洋想像，成為可知／可感／可觸的認知系統。又如黃遵憲的詩歌裏，呈現出「地圖」本身跟真正的外部世界有了裂痕；他與妻女談論外部世界時，顯示了創作和真實的距離其間的格格不入，正是容納想像空間的所在。從楊雲史的詩文裏則可以看到，作為外交官如何親身見證大國想像的崩解。〈哀南溟〉一詩呈現清楚的地緣政治問題：東南亞成為西方殖民地，中國錯過了契機。

此外，老師也以「根與徑」為題，介紹使節與早期文學社群對境外漢詩的影響。因為大多華人移民是體力工作者，少數的使節和文人因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沒有他們，文學很難形成。這些文人的創作一開始帶有對當地教化的性質，但也因此發散了文學的暖光，成為整體華人移民文學意識的起點。以黃遵憲為例，他在具備海外經驗多年以後，再次去定調他所看見的南洋世界，寫下了〈番客篇〉。在這篇作品裏，日常細節進入文學創作，使得詩與生活很接近。詩作中竭盡所能，用華麗的語言雕飾，盡量張揚中國元素，更反襯了遭遇到的現實局限和不堪的處境，這

就是番客進退失據的生活現狀。老師提醒學員，這首詩的主角是「土生華人」，也就是南方方言族群和南洋土生族群通婚的後代。這是「被發現的南洋華人」，他們的生命經驗顯示出，異族之間的語境是繁複的，這建立了漢詩另一種離散的效果；必須遊歷之後才能建立自己一套嶄新的、宏大的新視野。

而在注意到移民及其後代的處境的同時，當然也會注意到其中所蘊含的族群政治，以及境外漢詩的歷史意義。以梁啟超的詩為例，海洋在他的筆下不只是航道，還意味了一套話語體系。二十世紀初期，大量外部知識與經驗與太平洋相關。梁啟超所作的〈太平洋歌〉試圖調動接觸到外部後，知識主導意象的語序，顯示中國語序怎麼因著太平洋論述的崛起，而挪移到詩歌中；知識性的語言怎麼進入原先奔放、昂揚的詩歌語言。一套新知識、新認識的產生，顯示在梁啟超跨太平洋論述裏，藉由詩歌透露出來。二十世紀的太平洋，在中國詩人詩語言的主導下，從知識轉換為文學，這其中自然蘊含了詩人怎樣帶入自己在視域上的轉換，並包含了詩人本身跨越和移動的身體感。

在這場緊湊又精采的演講結束之後，主持人胡曉真老師期待學員們，能夠在最後一天的分組討論思考不同講座之間的對話關係。比如，在有了境外漢詩和華夷風的概念後，我們可以如何去看待廖肇亨老師介紹給我們的徐葆光與《中山傳信錄》；境外漢詩所呈現漢語和當地語言文化的碰撞，又能讓我們怎樣去理解訓讀與洋涇濱語。最後，胡老師還俏皮地讓學員猜想，高嘉謙老師如果加入了施懿琳老師的《臺詩三百首》團隊，又會選入哪些詩？無形之中，各個講次之間形成了一個更豐富、多元而廣大的思考面向。

會後訪談

近幾年進入研究所的研究生，不論研究領域是什麼，大概都無法忽視境外與移民文學的熱潮。高老師卻說，他把這個題目帶給研習營的學員，不是因為這個論題很經典：「我想談論的不是『經典性』的材料，也不是特別聚焦在詩學的討論。而是想將境外漢詩視為一個整體，去看見整體的能動性，並以『境外』和『中心』對話。」老師指出，離散文學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文學現象，各文體都參與其中。然而，傳統詩歌學研究談論這個時期的作品時，不是以「離散」為概念來討論，而是將亂離的現象視為短期的、當下的、情境性的。「我希望大家看見『移動』這件事造成了文化資源的傳播，近現代的研究其實『外部條件』的討論很重要，因為那往

往牽引著內部的變遷」，高老師如是說著，並且試圖提供學員一個更具動態、裏外參照的研究視野。

聽高老師的課會發現，老師總是提點著學生去注意「時間和時間」、「空間和空間」、「人與地之間」的尷尬、扞格和斷裂。他從不爲了要說出一個完整的論點和架構，而弭平或忽視這些不和諧的部分。相反地，這些不順、參差反而是人與時空碰撞時最真實的反應。「其實不順和參差不會只在離散的討論裏」，高老師笑得很自信：「各類文學研究裏一定都有這個現象，你們不要怕斷裂，不要怕去解釋它們。」於是我們追問，怎麼增加自己的研究實力，去處理境外漢詩的議題？老師說：「就是因為解釋不來、不好瞭解，這些議題才會留到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去建立一個解釋它們的視域，這是要慢慢累積的。首先是要有跨領域的思維，千萬不要封閉自己；其次，要有不斷嘗試、面對挫折的耐力，做任何問題都不要想著一步到位。」

順著講座最後胡老師拋出的三個議題，我們也趁著訪談的機會請教高老師，如果有機會參加施懿琳老師《臺詩三百首》團隊，老師會選入什麼作品？高老師苦笑一下，好像覺得這個問題有點促狹。想了一想才回答：「我重視的面向還是華夷之辨／變，那些非正編的、外編的作品，是我想補充進入臺灣文學之列的。臺灣作為海島，其實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像是身分的不斷轉變、民族性、不同時期的外來族群、海洋對這個島嶼的滋養和影響，以及主權的交接和所產生的各種情緒。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會是臺灣詩的特點，從明鄭時的反清正統到一八九五年進入日治時期，清朝未亡但已有遺民之情，這時又和一批能寫漢詩的日本文人碰撞，這中間的詩學能量其實很值得關注。」透過這個問題，我們彷彿能更了解高老師試圖帶給我們的境外視野，同時也更看見了施老師想提醒的臺灣文學的豐富性。

九、從《紅樓夢》第三十回，到 AI 機器人

駱以軍老師一登臺就先聲奪人，他告訴學員：「《紅樓夢》其實是一部科幻小說。」

駱老師的小說《女兒》裏，故事講述一個人要製作 AI 少女機器人，於是把自己腦內的一些概念灌入；其中好幾篇講的都是跟《紅樓夢》有關的故事。駱老師說，在大數據的年代，把大量的文化資本傳輸到個體是一件常見的事，同時也是一

件有歷史的事。因為，知識和個體如何互動，其實是西方常見的議題，而哲學根據的字根其實是「愛智」，關於愛的智慧。學生在與老師對抗的過程中，摸索出自己關於愛的思考形狀，知識的傳遞與接收從來就不可能是單方面、一成不變的。

「其實我想談如何將文學的精華灌入一個 AI 少女。關於文明的傷害、繁華，人不該羞辱別人也不該被羞辱，以及美是什麼、極致是什麼」，駱老師說。在這個無可避免要被裹挾進大數據、大運算的時代，當人類頂尖的棋士被 Alpha Go 擊敗，人突然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因為 AI 不只是電腦，而是利用圍棋相關的歷史、文化及人類智識的暗區，來擊毀現在的人類。所有立足於精準的、大量數據的、不能出錯的領域的最菁英的人物都可能被 AI 取代，所以我們知道人類文明精神的核心是文學，是詩歌，是小說。

駱老師說，小說牽涉到最細微的變化，比如內心的陽奉陰違，看似小細節，但其實是一個龐大的差異。到了《紅樓夢》這樣一個具有龐大人物群，人物群處處展演關係中的變幻莫測，到未來命運的未知，到協奏曲般的賦格，不同型態的情節已經演繹了未來，以及上下階層之間所導致的種種變化。「這會是一個可以使 AI 爆掉的超文本，在我心中，《紅樓夢》就是一個科幻小說」。駱老師的話語總在流行語和細膩的表達中擺盪，時不時引爆課堂的爆笑聲。

在駱老師看來，現代電影電視裏對於人物刻畫相當單一和臉譜化，這暴露出我們這個世代對於《紅樓夢》或曹雪芹筆下女孩的認識多麼貧乏。後世作家對女孩各種型態的可能性，只繼承了《紅樓夢》一個面向，無法體會小說的場景縱深，以及人物間的關係無比的複雜而廣大。老師於是分享他對生活中遇見形形色色的女孩的觀察，頗有一種《紅樓夢》「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悲憫。

藉由分析《紅樓夢》三十回，我們在老師的指引下，看見如同鏡頭語言般多次轉換場景、人物情緒、人物互動和關係，是多麼緊湊而劇烈。靜下心重讀《紅樓夢》的時候，會發現這個小說可能是可以讓人的精神世界最為豐富的，因為它所牽涉的場景及人物彼此關聯互動，真的就是人類文明的全景；人類的暴力、殘忍、美與虛無。只看愛情或生死，其實都不足以完全理解《紅樓夢》。

駱以軍老師從自身對西方文論愛好，講到如何進入古典小說的研究，一個從望向西方、望向現代、望向理論的靈魂，回看東方、回看古典。曾經耗盡心力進行小說的書寫實踐，卻發現自己心血崩解的駱老師說：「這時候回頭看看瓷器、看看《紅樓夢》，是另一個學習。」

會後訪談

能夠在學術研習營看到駱以軍老師是讓人驚喜的。在八場高強度的學術演講之後，駱老師帶著小說《女兒》來告訴這群研究生們，中國文學經典對於學院以外的世界有什麼價值。

「其實中國的《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都非常有趣，他們的觀測方式、人物塑像至今仍然有可與當代呼應的地方，實在不需要關閉在經典的櫥窗裏面」。駱老師分享作為創作者的心得：「曹雪芹以一己之力在生存的現實之外構建內在的宇宙，這是《紅樓夢》最讓我震撼的地方。」在當代，這種一切都濃縮了，快速地去感知、去獲取的資本主義時代，所謂「未來美學」似乎是悲觀的。作為二十一世紀經歷過科學與科技的現代人，似乎無法避免背上時代的重負。這時重看《紅樓夢》乃至中國的文人畫那樣精緻的、複雜的藝術作品，駱老師拋出一個尚未解答的疑問：「我們能藉著《紅樓夢》度過這個坎兒嗎？」也許現在的我們都沒有答案，但駱老師的分享，讓我們看見經典文學作品的當代意義。

營隊花絮

為期四天的「非|常經典」研習營，除了安排九場講座外，還有三場分組討論的時間，並在每天早上特關時段，讓各組上臺分享討論成果。讓學員能夠即時地感受對同一主題的不同觀點和視角。

作為潛伏在學員之間的特派觀察小組，我們注意到導師對於小組討論的風格有決定性因素。比如有些導師擅長有理有據地解說組員疑問；有些導師很能夠帶動討論的氣氛，回應學員的同時，不斷「逼迫」同學去反思、去更精準地表達；有些導師盡量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只在必要的時候稍加指導學員的發言方向。因此，五個組別在四天的討論和相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風格。

隨著時間的推進，可以看見個人是怎麼經由一次次小組活動逐漸成為團體的。第一天晚上的分組討論，幾乎每一組都要花一些時間破冰。學員發表意見時，也比較像是對於課堂猶有疑義的問答。令人驚喜的是，第二天之後，各個組員幾乎都能提出完整的論點，清楚地意識到有時學術議題的討論不只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觀點和角度的差異。一位導師在受訪的時候提到，自己所負責的組別裏年級跨度比較



廖肇亨老師參與小組討論

大，一開始自然是博士畢業的學長姐發表的比較多，碩士班一年級的學員則有點遲疑卻步。「但是我覺得學長姐們真的很會帶」！老師感嘆：「我可以看到第二次討論開始，年級比較小的學員就開始學習學長姐論述的方式，試著從不同角度去想問題。提問、引證、作結的方式馬上就不一樣了！我看了真的好感動，這就是小組討論的意義。」另一位老師則分享，自己原先的印象是臺灣學生都比較被動，但這次發現小組裏不管來自哪一個地方，都非常踴躍。「我覺得，一來是因為大家年紀相近，又都比較年輕，說什麼都沒有包袱；二來是因為，這個營隊的主題和面向對象很明確，願意來的學員就是真的有興趣；第三點，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現在念研究所的這批小朋友，他們在求學過程中受到的教育是鼓勵他們發言的，跟我們以前不一樣。所以世代已經不同了，我們的想法也要跟著改變」，老師這樣總結他對這批學術新生的觀察。

導師對小組學員的影響力自然是鮮明的，但學員們也勇於在討論中表達自己的看法。比如在討論李杜優劣論時，在導師提出杜甫作為詩聖上承《春秋》的詩史淵源後，立刻有同學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詩聖」是從宋代一祖三宗的概念以後才成形的；老師於是藉此向學員介紹不同專業、關心不同領域的學者，可以用怎樣不同的方式去認識杜甫。另外一個小組，因為李杜孰優孰劣的問題分成兩派，進行相當

激烈的辯論。也有小組在第二天的綜合討論上臺發言時指出，他們認為到了現在這個年代，標準都是浮動的，哪裏還需要評斷優劣呢？這些不同面向，顯示出學員們關心的議題和討論方向，可能與講座設計時的預期不同，但也因此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訓讀」專題上。好幾位導師在受訪時都提到不知道怎麼帶學員討論訓讀。「我不知道學員會不會有興趣，萬一他們沒興趣或聽不懂，我可能也沒辦法教他們，因為我也對這個領域很陌生」，一位老師這樣告訴採訪小組。據說，導師們在前一天晚上還聚在一起焦慮了很久。幸好，當天晚上的討論，最熱烈的反而是訓讀。課堂上已經有同學用客家話來討論語言接觸的問題，讓講師高津孝老師覺得很有收穫。小組討論時更有學員以香港「三及第」（文言文、白話文與廣東話交錯）寫成的詩詞進行討論；認為三及第足以用來和訓讀討論的原因，在於兩者都不是語言，而是語言交流之後的產物，和「洋涇濱・克里奧語」不一樣。值得注意的是，談及香港特有的文體，參與討論的，不只是來自香港或在香港求學的同學，也有人一路在臺灣唸書，卻因為對香港文學的愛好，而對此一議題相當熟稔；讓人看到學員對研究的熱忱和彼此交流之後的收穫。

隨著營期的推進，討論的議題也開始出現不同講座之間的對話。有小組就以李杜優劣論和《金雲翹傳》的經典化過程對比，認為杜詩是經由後代詩人的學習而成為經典，《金雲翹傳》則是流傳到海外之後，以不同語言、不同文體重寫而獲得認同。這說明了「經典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能具有許多不同的模式。回到到營隊的主題，發表的學員認為，「非」常經典就是因不同文本及具體的特性，所產生不同的成為經典的過程和範式。另外有小組提到，從琉球使節、越南《金雲翹傳》、《海南雜著》到日本的訓讀與和刻本、單士釐對日文著作的翻譯、臺灣古典詩人對中國文化的吸納，再到域外漢詩的討論，他們注意到的是，「交融性」如何使作品有成為經典的潛力；因為不同時期推動製造的標準不同，讓後人可以再思考經典如何構成，以及現階段我們又能認可怎樣的作品為經典。

對於營隊主題，有小組進一步提到，「去經典化」也是經典化的一環。除了思考誰該成為經典之外，是不是還能想一想，所謂經典受到既有標準和價值的影響有多少，甚至，能不能「沒有經典」？而從陳益源老師期許《海南雜著》被選入國文課本，到施懿琳老師帶著學員分析課綱爭議，也有學員開始注意到，經典的構成不能脫離國、高中的國文教育。「國、高中老師真的很重要，我現在想想，帶著我一

開始去認識、詮釋經典的，就是我的國文老師啊」！一位學員這樣說。

從九場精彩紛呈的講座，到百花齊放的小組討論，跟隨著「非 | 常經典」研習營一路閱讀、一路思考、一路討論四天，深刻地感覺到，能夠把這麼多不同領域的老師、學員聚在一起，是多麼可貴的體驗，又是多麼動人的學術能量。正如代表科技部人文司致詞的鄭毓瑜老師所期許的：「我們常常以為做研究是自己一個人拼命讀、拼命寫的事，其實，學術是眾人一起成就的。你讀的每一本書、每一篇審查意見，甚至這樣一場盛會，都是其他人在幫忙你一起做研究。所以我相信，雖然營隊將要結束，但只要你們不放棄，我們在學術的道路上一定會再相見。」



全員至鹿港進行文化參訪

二〇一八年燠熱的夏季，我們從各自繁忙的日程中抽身，全心浸淫在一場學術的洗禮。而我們都知道，對「研究」的努力，對「非 | 常經典」的反思，仍然是一條漫長的、亟待探尋的道路。期待一直一直走下去的我們，終有一天會再見！



閉幕式心得分享



小組頒發結業證書